

第四辑

文选·运命论
唐太宗书《温泉铭》
欧阳询书《化度寺》
柳公权书《金刚经》
春秋经传集解
高适诗集
周易经典释文
妙法莲花经
因明入正理论

澄神禪觀則
有化度寺僧
禪師者矣禪
師俗姓郭氏
太原人
昔有周氏積

敦煌研究院編

庫



敦煌書法庫

啓功題



第四輯

唐代

敦煌研究院 編

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 江
装帧设计：刘 江

敦煌书法库

第四辑

敦煌研究院编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12.5 插页 5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88-123-5/J·107 定价：68.00 元

目次

唐代书法艺术与敦煌写卷	一
唐写本《文选·运命论》	十六
唐拓本《唐太宗温泉铭》	十九
唐拓本欧阳询书《化度寺》	三一
唐拓本柳公权书《金刚经》	四四
唐写本《说苑·反质篇》	六二
唐写本《御注金刚经》	七八
唐人临十七帖残卷	八四
无上秘要	八六
春秋经传集解	九一
高适诗集	九七
越州诸暨县香严寺经藏记	一〇三
周易经典释文	一〇九
道德经序	一一三
众经别录	一二〇
景教三威蒙度赞	一二五
大乘起信论	一二九
妙法莲花经	一四三
因明人正理论	一六九

唐代书法艺术与敦煌写卷

郑汝中

唐代，是中国历史较长的一个朝代，它的统治时间为280年，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在文化艺术上也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如果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唐代书法以及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写卷，无论从时代的书风，地域性的特征，当时全社会的书法活动，书法意识，以及书体的衍变，民间的表现形态，都有某种特殊意义。为说明这些情况，笔者拟从下列诸方面，略作阐述：

一、书法的盛唐气象

中国书法自秦汉、魏晋之后，隋唐是个重要的时期，由于汉字书写的普及，社会文明的日益发展，文化艺术的传播，佛教文化的兴盛，各种因素的汇合，在唐代形成了一个书法艺术空前的繁荣时期，我们把这段时间称之为书法艺术的盛唐气象。

研究敦煌写卷书法，不能孤立的研究，它是在全国书法形成、发展、传统的大趋势下，产生的局部文化现象。尽管我们发现敦煌写卷琳琅满目，瑰丽多姿，但它尚未有自己的独立体系，纵然现在常说的「经生体」，也毕竟是大气候中的小气候，因此，不能割裂总的历史背景，还必须看全国的书法潮流。

唐代开国之先，是隋代统治时期，隋代时间只有38年，时间虽短，但在书法史上，确十分重要。这一点从大量的隋代遗存的墨迹中可以看出，它合南北书派为一体而结束了魏晋时期以隶书为中心的书法面貌，具有开拓性的形成了以楷书为中心的书法局面。由于隋唐书风颇为相近，其间关系紧密，书法史上往往称为「隋唐书法」。在隋末唐初，相继出现了以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等为代表的书法名家。以他们独具风格，既有继承又有革新

的书法创造，强有力地影响了全社会的书法意识和书法活动。

唐代书法所以能形成高潮，主要也是与宫廷、官署的重视、提倡有关。所有的皇帝都是热情的书法艺术爱好者，并且身体力行，参与书法创作、研究和推广普及工作。从历史记载看，自太宗李世民之后，高宗李治、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顺宗李诵、宣宗李忱乃至宪后、武后都有大量篇幅，记述他们在书法活动上的事迹，当作德政表彰。不但如此，就连他们左右的亲王、侍臣亦均笃好书法。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提倡、偏爱，使得书法艺术列为文艺之首，并靡成风尚。乃至国家采取了以书为教，以书取士的政策。据通典载：「自贞观二年（628年），复置书法，设书学博士，收徒讲学」。当时，朝廷中之崇文、宏文两馆，要求必须「楷书道美，皆得正样」，诏令文武官员研习书法，国子监内设书学博士，但必须以王羲之书法为楷模，公开采取行政措施，弘扬书法艺术，以书法铨选官吏的政策。

纵览唐代书法，可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继隋代虞、欧、褚、薛之后，王羲之曾被推崇到一个极高的境地。这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独尊二王的结果，他本人书法极有功力，曾有不少碑帖传世。当时，李世民的书法，也是社会上风行的范本。他癖好二王，传说不惜重金求购二王墨迹，命人大量临摹王羲之「兰亭序」等帖，分赐给朝臣权贵。因此，当时书法家冯承素、赵模等的临摹作品，风靡一时，为迎合时尚，诸名家、士大夫皆宗法右军。

但是，艺术的规律总是要发展的，于是出现了创新、蜕变的情况。在崇尚二王之风延续了相当的时间，直到开元之后，颜真卿书法的出现，才把社会的书风转向了一个新的视野。因为二王之书风，毕竟还是晋的藩篱，还算不得是唐代所创立的书法风格，唐代的书风，应从颜真卿的「变法」开始，颜真卿继承了前辈的传统，「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后来宋代黄庭坚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回视欧、虞、褚、薛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就一针见血地说明唐代书风创新，是从颜真卿开始的。颜真卿的楷

书结体粗壮，点横竖笔重横笔轻，方笔圆笔互用，以竖笔之环抱取势，线条雄沉肃穆之中寓飞逸舒和，形成别开生面，划时代的创举。颜真卿不仅楷书创新，他的行草，也独树一帜。据说他曾拜张旭为师，并从二王书法中吸取了很多养料，自己创出新的行草书体。从他的《争座位》、《祭侄稿》即可以看出颜真卿重在用笔，新在具有个性，龙蛇生动，神采艳发，他能把握篆隶笔法，用于行草书中，折钗、屋漏、印泥、画沙兼而有之，从结字、谋篇都超越了王羲之的面貌。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许多书法家，如孙过庭、张旭等，都是唐代初期的名家。他们的著作和作品，对草书的规范、定势，在全社会有极大的影响。

中期，唐代开元之后，以颜真卿为代表的书风，蔚成风气。继颜之后，又出现怀素、李阳冰等大家，对唐代中期的书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一番酝酿，颜真卿的书法，特别是他的楷书，又进入了低谷。人们觉得他的楷书，气势肥厚，仍受隶书影响，于是又出现了柳公权、沈传师书法形态，但这时已进入了唐代晚期。唐代中期，涌现出的书法家有：贺知章、李邕、徐浩、李阳冰等人。

晚期，以柳公权为代表，继承颜体衣钵而青出于蓝，并有新的发展。他的楷书既避「欧体」之劲险，又扬弃「褚体之过于柔媚」，也一改「颜体」雄浑肥厚，隶法遗绪，开辟出自己的风格，确立了竖挺、端庄、骨架匀称、字形方整的形态。可以说，直至柳公权，楷书才确立了标准字型，走进了完全成熟的境界，彻底摆脱了隶法捺、顿的余绪。晚期除柳公权之外，尚出现裴休、杜牧等名家。

书法的盛唐气象，也表现在书法理论的著述方面。当时的书法理论包括：书法历史，书法美学，书法艺术哲学，书家评论，作品评说，字样字形规范，技法探讨，笔势，书体分析等诸多方面，经过官方刊布，民间传抄，有力地指导和促进全国的书法进程。有些极为精辟的论著，至今为人们借鉴。如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书议」、「用笔十三法」，张彦远的「法书要录」等。

综上所述，是唐代书法的「大气候」，是书法正史所记载的情况。但是书法艺术的发展，

还有另外一条渠道，那就是民间的书法历史。敦煌藏经洞所出的写卷，充分地表现了这个渠道的情况。

二、书法与佛教

佛教，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刻。自汉魏至明清，这一外来文化，不但渗透在各个领域，而且有喧宾夺主之势。因此，不能回避，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在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甚至超过了它在印度的影响。

单讲我国书法艺术，就与佛教有不解之缘，可以这么说，佛教与书法，是个因果关系，佛教的传播，促进了书法的形成和发展，而书法的发展，也促成了佛教的兴旺和繁衍。当然，中国书法的历史过程，是多种文化渠道促成的，并不完全依赖于佛教，但从大量资料来看，佛教因素是巨大的，绝不可低估。

我国汉文字的形成，由来久远。从萌发、衍变、到发展成熟，时间相当漫长。如果从殷商甲骨文时期算起，文字的历史约有五六千年之久。但实际上社会通用共识的文字，其时间只有两千余年。此时正是印度佛教兴起并传入我国。当时，尽管我国在哲学思想，文化艺术上已十分发达，但在文字上尚未成熟。无论从字形的确立，书体的形成，书写形式，书写工具，传播方法上还相当落后。直到魏晋南北朝，通过佛教经典的流传，文字才趋向普及。之后佛教大兴，寺院林立，信奉佛教，参与佛事，已成为我国朝野僧俗重要的精神生活，而且势如潮涌，信奉人愈来愈多。为了表示虔诚，当时最主要的一项活动就是把译成中文的佛经写在纸上，或刻在石上，将传播佛经视为功德和时尚。很快就扩及全国，掀起了以写经为目的的书法活动。上自帝王，中至官署、寺院，下至黎民百姓，皆潜心投入，浸淫成风。因此，就大大地促进了文字的改革，形成手写汉字的多种风格和传播方式，到了唐代发展至高潮。

抄写佛经的集散和组织工作，除宫廷、官署有其专业机构和职业缮写佛经生员外，一般基层都是由寺院来承担的。

寺院，是政府协助兴办的，原为僧侣聚居修行供佛的场所。但在我国古代，它的功能远

远超过了本来的范围，它是文化活动的摇篮，除了参与一定政治、经济活动之外，也还承担了社会的教育和文化艺术事宜，犹如今日的文化馆，它以其宗教信仰的凝聚力，对社会各阶层开放，是沟通宫廷、官署和庶民，联系群众开展各种活动的场所。

从现在莫高窟遗迹看来，唐代敦煌地区的佛寺是非常兴旺的。据资料反映，唐时比较大的寺院就有十八座，可以想象到当时香火之盛况。正因为寺院林立，佛事活动频繁，所以藏经洞内收藏了大量的写卷，这些写卷数量最多的也是唐代的墨迹。

佛教经典，除了民间大量手抄本外，还有一种形式，是刻在石头上以求永久保存的，所谓：「缣湘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因此，就采取凿石刻经的办法，以求雋永。石刻经文、经幢，也多见于寺院之中，因其工程耗费巨大，一般民众难以承担，多为官方或大寺院镌刻，多为名家高手所书，也有供人观赏书法的意图，因此，也属书法作品，有极高价值。

综览传世之碑帖，其中绝大多数内容与佛教、佛事有关。佛教题材充满中国书法作品之中，历代名家如张芝、钟繇、王羲之、颜、柳、欧、赵以及各朝代的帝王将相，无一不参与佛教的书写活动。由此可见，佛教渗入我国书法文化，是多么势力雄绝。

历代僧侣，善书者甚多。唐代就有：怀仁、怀素、鉴真、贯休等高僧多人，其作品传世，在书法史上有重要作用和地位。

缘何佛教对我国书法文化，有如此之渗透力，其实也不难理解。佛教进入我国成为我国全民的精神生活，哲学思想，文化艺术乃至民众的日常信仰，佛教均占主导地位，潜移默化烙印深刻，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真正衰落，失去主导地位才不过近百年，用数字比例为：20：1而已，因此，难怪有如此之影响。

三、敦煌唐代写卷

在发现藏经洞的写卷之前，历史上的书学多为相袭承传之说，把视野局限在仅有的碑帖、拓本领域，对屈指可数的历代名家书法，经过包装之后，形成评论定势，实际上比较偏面，所

宣传的都是帝王将相，上层文人的书法历史。当然，也应承认那些书法作品，确实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它毕竟是局部名人之作，而且缺乏科学的论证，往往似是而非，含混模糊。所见作品又都是几经转折，临摹或拓本，而真正能看到的古代墨迹，确为凤毛麟角。宋代以前真迹很难见到，偶有残遗之唐人墨迹，则视之为惊人秘籍。敦煌大量各朝代的写卷发现，确实使人们开拓了眼界，这些活生生的材料，给中国书法史翔实地填补了空白，不但显示了唐人书法，甚至上溯到魏晋时期的墨迹，说明了「法帖」之外尚有洞天。

遗憾的是，虽经发现，但大量的写卷已流失于国外。目前只能从缩微胶卷或出版的部分写卷，以及国内收藏少量的材料虽可见真情况，但欲研究古代之书法原貌，还是不甚方便。

笔者因学识有限，仅就见到的一些材料，对唐代的写卷，略作如下介绍：

（一）在藏经洞发现的写卷：

上迄两晋，下至宋元，很多没有纪年题记，但就有纪年可循的写卷，几乎每个时代，年号的作品都有，它可以连接起来看每个时期的书法特征。在约五万多件的写卷中，唐代的比重较大，粗略估计可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因此，唐写本可谓主流。

唐代的汉文写卷，不仅是佛经。其内容比较广泛，有其他宗教的经典，有儒家经史典籍，有文学诗词作品集抄，有寺院、官署文书，民间课本，杂抄等。因此，书写人的社会层次较宽广，书体、风格也趋多样，瘦瑜并存，鱼龙混杂，除有大量精品可以称为书法艺术作品之外，也存在着大量不成体系、质量低劣的墨迹。

（二）有关书法资料，列举如下：

① 见存王羲之十七帖临本残件三纸（S3753、P4642），为「龙保」、「旗颺」、「其书」三帖残片，三件似为一人手书。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是亘古千年的传世瑰宝，最早文字记载见之晚唐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传说有初唐之刻本，但宋代以后才见有刻本、拓本。因此，敦煌有此写卷，弥足珍贵，此残片均为唐时墨迹。清代乾隆皇帝只收藏有三十余字的「快雪时晴帖」的摹本，即视为珍宝，以「三希堂」命名，建阁珍藏。现敦

煌所示之三件，当更珍稀。

② P2555号卷中，有一组唐人诗集，其中突见「王羲之宣示表」一段，宣示表原为钟繇所书，此文张冠李戴，显然有误，但写者对王羲之作品颇为熟悉，写成「王羲之白」，也说明这两位名家，在民间有相当之影响。

③ 写卷中，有蒋善进书「真草千字文」临本一段，起于「（侍巾）帷房，纨肩贞洁」，终至末句「焉哉乎也」。卷尾有题记：「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蒋氏所临此千字文，功力极佳，牵丝连带，平稳自然，精神气韵酷似智永所书之拓本原貌，绝不逊于当时其他摹本。遗憾的是所存太少，只有34行一百七十字。此确为初唐之作品，实为难得的精品。

④ P2780卷，《大唐三藏圣教序》片断系临摹褚遂良之作。用笔结体，乃至异体字用法，均宗褚字的原样。

⑤ 篆书千字文残片，共见二纸（P3658、P4702），此篆书千字文，原为一卷，明显出自一人手笔，一为七行，一为五行，共计一百二十字。此为民间流行的篆书，它类似道家符篆之用字，造型古朴自然，结体盘曲，弯转自如，寓圆于方，左轻右重，疏朗空灵，有一定的古篆法度，但与《说文解字》距离较大，属于民间创造的字样，其中甚至有隶法、楷法的成分。在敦煌写卷中，有一道教符篆写卷（P2865）《太上灵宝洞玄灭度五练生尸妙经》，与此篆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文字虽然不得识，但确系汉字偏旁，部首组合而成。这种有神秘色彩的字形，也并非随心所欲而成，它们是汉字经过变形，具有符号性质，其中融汇篆、隶、楷书，弯曲回环，参差叠绕，变化离奇。抽去其宗教内涵，应该说也是民间的一种文字现象。

⑥ 兰亭序全文（P2544），为民间抄录的写卷，书体欠佳，但也从此卷看唐时流传的全文内容，字里行间也可见有冯承素临本的面貌。

⑦ 欧阳询书《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为唐李百药撰文，贞观五年（631年）镌石，此碑早已不复存，传世有几种拓本，但多已失真。敦煌所出此拓本，当是接近原貌，只是此拓本现分藏英、法两国。欧阳询书法结体倾向于平扁，圆润淡雅，宗法钟王，受汉隶影

响，古朴险劲。

⑧ 柳公权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P4503)，为一卷装拓本，此卷首属完整，卷末有题记五行署曰：「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四月六日，翰林副书学士朝议郎、行右补阙，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柳公权为右街僧录准公书，强演、邵建和刻」。此碑为柳公权56岁时代代表作，精力充沛，神采焕发，表现出笔锋刚健俊秀，于坚挺匀称之中见其风骨特性，有一气呵成，全局照应之功力。

⑨ 唐太宗《温泉铭》(P4508)，为行书剪装拓本，共存50行，有初唐「永徽四年」之题记。为李世民之行书御笔，其书骈丽流畅，雍容大度，有明显的二王书风。此行草书体刻碑，唐太宗为第一人。

⑩ 马云奇诗《怀素师草书歌》(P2555)，为歌颂唐代草书名家怀素之诗文，赞叹怀素之书法造诣，诗为七律古体，作者马云奇事迹未详。唯其内容与怀素之《自叙帖》情况有异。是研究怀素的重要史料。

(二) 有关「字样」、「字宝」：

在唐代的写卷中，有很多字书，诸如「字样」、「字宝」、「碎金」等等。这类名目的墨迹，是汉字普及、规范的启蒙读物，也是民间认字、写字、普及教育的重要材料。

自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之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字书，如《字林》、《玉篇》等。社会上使用文字相当混乱，存在着正体字与俗体字并存的情况。为了统一和规范文字，唐代官方机构，进行了一些文字改革、研究、整理并编纂了一些字本，如颜元孙著《干禄字书》、欧阳融的《经典分毫字样》、张参的《五经文字》、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玄应著的《一切经音义》等，收罗了大量朝野通行文字，厘定所谓：正、俗、通、讹的文字，实际就是当时的字典，对社会文字的规范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官方推行字书之外，在民间还另外有自己的文字流通渠道，这就是写卷中涌现的大量字书，其名目很多，不及细载，今检一些重要的，例举如下：

《正名要录》(S388)、《时字样》(S5731)、《新商略古今字样》(S6208),还有《千字文》、《太公家教》等类带有释意、训诂类字书。这些字书,没有编著者姓名,分类、注释方法也不相同,为自编、自用、自行增减的民间传抄的课本教材,这是当时社会上唯一传播文字的方式。其中和官方刊布的字书有一定距离,充分的灵活机动,反映出民间用字之丰富和时代的文字语言特征。其至有方言、口语字书。总之,这些就是「俗字」字典。这些字书,对儿童及成年人的识字、写字都极为实用。

另外,写卷中有许多民间创造的字,其中有简笔字、合体字、异体字、代用字,也有唐代的避讳字。这些字查无出处,也未见字书收录,但简括、省略、实用。计有:形声、会意、增减构字部件、草书楷化、偏旁部首移位等方法。无拘无束,大胆发挥创造和约定俗成,形成浓厚的敦煌地方特色。

(四) 唐代写卷中的书法理论资料:

民间书字,比较重视实用,很少咬文嚼字地研究写字的理论,因此,写卷中传抄的官方有关书论甚少,但也有一些:

一为P4936号,是王羲之《笔势论》唐代抄本残件,首尾均残缺,残泐中尚存20行墨迹,并没注明「王羲之」及「笔势论」字样,但从遗文所见,确系王羲之笔势论的内容,此为民间流传,经过加工,后人发挥、注释而成的文章。经与其他传世的版本对照,只有三分之一为原文,更多为民间的杜撰,主要是论述写字方法,对「结体」、「书势」列举许多禁忌,如笔划的比例关系,是短、宽、狭,字与字的排列秩序,都有详尽和精辟的论述。因全文较长,现援举两段如下:

「若欲学书者,细看书大此脚不宜矧,……角不用峻,峻则生混,混则成棱,重字不宜长,长则大丑。单字又宜小……字不宜大,大则也破单,密胜短胜长。」

「字体之法,并宜上宽下狭,□头小尾,大不相称。复不伤密,密则疴瘵缠身,不能舒展,复疏则似溺死之人,诸处伤慢。伤长则死蛇挂树,腰间无力。伤短则似踏暇蟆,横阔则大丑

也。此乃书之大忌，且勿为之。」

可以说，这是根据王羲之「笔势论」改编的一篇写字方法论。

另一件为王羲之残卷（P5背），此卷在一回鹘文写卷之背后，全文已不可辨，只留序言的前数十字。

在写卷的字里行间，有时也夹杂着一些民间的书论，如P3189号《开蒙要训》，尾题有一首诗云：「闻道侧书难，侧书实是难，侧书须侧立，还须侧立看」。这就是一种美学观点，「侧」就是欹斜，不正。写字需要有正欹的变化对比，反对平正呆板。

（五）唐代写卷的书体：

唐代的写卷，虽然各种书体齐备，但综览全局，大部分还是楷书、行书或草书。隶、篆的使用很少，所以还是以主流为对象进行探讨：

唐代写卷的楷书

楷书，是隶书蜕变的结果，它是在隶书的行体和草体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唐代的楷书，是我国汉字从隶法进入正楷的成熟和完善阶段。从一些有代表性的名家的楷书面貌看，已经逐渐地摆脱了隶法的笔意，基本上已摒弃了蚕头燕尾，分张提顿的古拙、质朴的隶法书体，确立了以端庄、周正、方饬、圆润、倚丽为特点的形态。并扩展到全社会，明确了楷书的规范式样。

细诂敦煌写卷中的楷书，唐代的风貌，可分为三种类型：

① 严正型：以当时名家为楷模，严格尊守法度，以典雅、凝重、稳健的笔法，毕恭毕敬书写的正书。这种端庄、严正的楷书，多见于录写佛经、道经或其他宗教的经卷，写得整齐，遒劲有力，通篇一丝不苟，犹如印刷品。其中有些酷似欧阳询、颜真卿的楷书，功力深厚，书写时间甚至先于诸公。但也有许多过于严谨，失去灵活生动，形成呆板，僵化，状若算子的局势。

写卷中楷书精品有：P3642《金刚般若波罗密经》，P2088《维摩诘经》，P3471《仁王般若

经》，敦研336《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P2804《越州诸暨县香严寺经藏记》，P2173《御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P3831《三藏圣教序》。

此外，在写卷中有一批道教的写卷，写得漂亮，有功力，几乎件件俱佳。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缘何佛教寺院中，存有大量精致的道教写卷，且优于佛教写本，可见当时，佛道兼容并蓄，互为借鉴之实况。

道教写卷楷书精品有：P2624《颜师古撰玄言新记明老部》，P2465《太上本际道本通微妙理》，P2170《太玄真一本际经》，P2457《御本阅紫灵仪》（二年一）说》，P3663《残道经》，P2602《无上秘要卷第廿九》。

② 行体型：这是一种近似行书形态的楷书，其结体疏朗舒展，一笔一划并无连带，属楷书范畴，但字体并非方饬端正，具有行笔轻快，流水行云，飘逸自如，有明显的行书的速度感。这种楷书俊秀有活力，文质彬彬，有浓厚的书卷气息。多见于宗教以外的儒家典籍写卷。唐代中后期，这类型的楷书，逐渐增多。

行体型楷书有：P2510《论语》，P2540《春秋经传》，P3847《景教二威蒙度赞》，P2155《曹元中状》。

③ 个性型：这是一种具有艺术趣味的楷书风格，它与社会上流行的楷书都不一样，有自己的个性、风姿。而且非常成熟和定型，已经成为个性的笔势规律。

个性型楷书有：敦研328《说苑反质》，字型略扁，似元代赵孟頫楷书。P3862《高适诗集》。字型宽博、圆润、疏朗、厚重，有颜字风格，酷似清代何绍基的楷书，此卷当为极精之作品。P2617《周易经典释文》，酷似颜真卿书法，用笔厚重，横细竖粗，浑雄有力，不逊于颜体，另有其敦实魅力。P2155《唯识廿论序》，小楷细字，笔法酷似宋代赵佶的瘦金体。P2838《云谣集》，用笔飘逸、放纵，欹斜有序，是一种率意的楷书。

（六）唐代写卷中的行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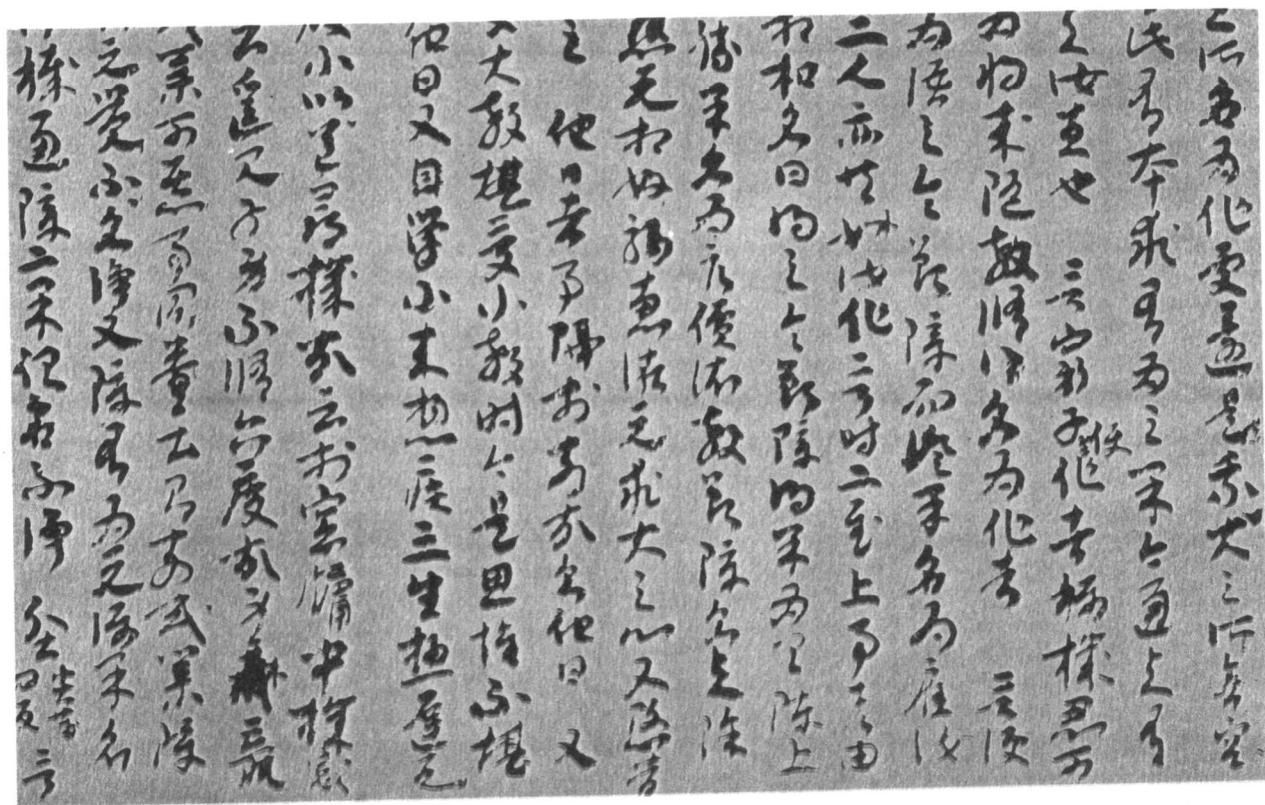
汉字书体的衍变，按习惯说法，人们自然会排出这么一个简单的衍进思路，即：篆——

隶——楷——草——行的过程。其实不然，从现在所见之材料，特别是一些出土的，民间的书法遗迹看，各种书体孰先孰后，尚待斟酌。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它已不是当时小篆的形态，很明显的已经成了简易、可辨的隶书，而且已有侧锋、出锋、连带的行草用笔特征。甘肃居延汉简、长沙马王堆的帛书的发现，已见楷、行、草的端倪；另见秦汉时代的砖文，民间早已产生行书，甚至今草的迹象。由此类推，汉字的各种书体的形成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有待于综合地探讨。但是，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两个特点：第一，民间是各种书体的创造源泉，无论那种书体，都是先从民间萌发开始的，都是走在前面的。第二，各种书体都是混杂出现的，很少单一的使用一种书体。以实用为出发点，没有清规戒律。

回过头来看敦煌写卷，也是书体驳杂，相兼并用的。细审唐代的行书和草书，它受全国大气候的影响，这就是以王羲之、智永、张旭、孙过庭、怀素等大名家的楷模。也同时有地域性小气候的特点，表现在书体风格上的形式多种，异彩纷呈。

写卷中的行书

行书，是民间最常见的书体，敦煌写卷中数量较多。它是楷书与草书中介的书体，是一种楷书快



妙法莲花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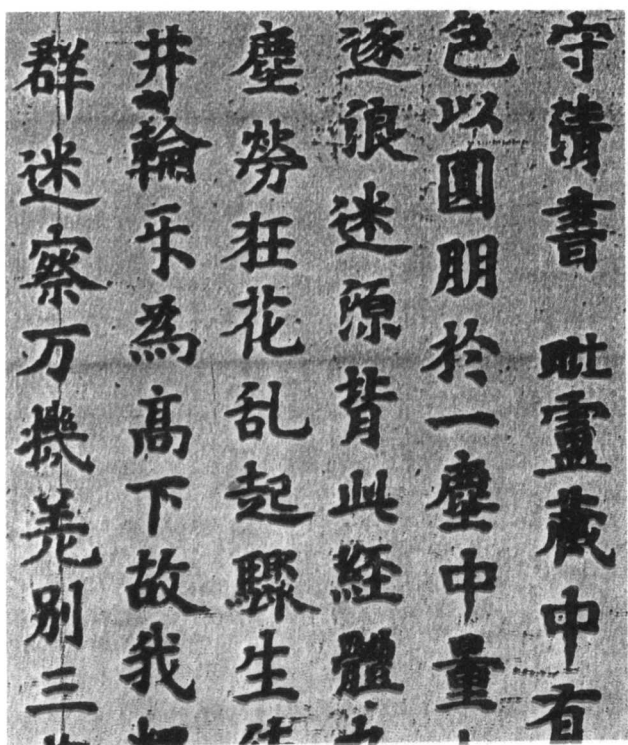
写，草书慢写的形式。

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行书作为一种书体，是应有其基本结字法则的，但实际上它与楷书、草书在习惯上却难解难分。在写卷中像「兰亭序」那种纯粹的行书并不多，而常见的却是「行楷」或「行草」混杂的书体。

写卷中行书用途甚为广泛，除了正规的写经之外，一些辅助性的经文注释、疏讲、略述及寺院的经济文书，官署的牒状，民间的书信、医方、杂写等多用行书。因其易认、易写、方便快捷，所以发展的很迅速，行书的艺术趣味也各具姿态。有的剑拔弩张，雄浑健壮，有的娟秀纤细，温文尔雅，也有突出的精品。如有一写卷P4640号，全卷甚长，其内容有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为敦煌地方志和高僧传记，后半部分为寺院用布疋、纸张的帐目。通篇用流畅的行书记写，笔法老练，有一气呵成之势。此卷纯系敦煌当地书手之遗墨，完全可以作为行书字帖。可见当时行书的水平极高，应视为当时当地民间的代表作。

写卷中的草书

草书，是书法艺术进入高级阶段的一种自我表现，最完美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形式。时至唐代，草书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境界，从写卷中反映出来



越州諸暨縣香嚴寺經藏記

高适诗

